

评《清史稿辞典》

张 玉 兴

2008年11月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巨册装帧精美，洋洋750余万字的《清史稿辞典》（以下简称《辞典》）。这是该社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为人们阅读中国传统史书提供方便，投巨资精心打造的二十五史辞典系列工程的组成部分。以工具书的形式，对备受世人瞩目的《清史稿》解疑释惑，传递清史知识，无疑是文化学术界一件很有意义之事。这部书，尽管在众多撰稿人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年来学术界对《清史稿》研究的成就，对人们认识清史有所贡献，然而，《辞典》却大悖人们的热切企盼，谬误甚多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。谨就此剖析如下。

一、取得成果 值得肯定

《辞典》顾名思义，是诠释《清史稿》的辞典。众所周知，《清史稿》因其本身存在问题甚多，从问世之日起，便是一部颇有争议的史书，这就决定了《辞典》不仅应该清楚解释《清史稿》所展示的诸多内容，为准确传递清史知识，还须于释文中指出《清史稿》存在的问题，并弥补其缺漏与不足。《辞典》于此做了努力，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果。

（一）纠正谬误

《辞典》对《清史稿》谬误的纠正，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。

纠正八旗表述之谬。《清史稿》中有关八旗称谓的表述颇为混乱。清朝从初创时即有的八旗制，是一种特殊制度，一切军民皆在其统属之下，所谓以旗统兵、以旗统人。因而凡言某人在八旗中的位置，只能先言旗别，后言分属，而不能倒置。然而《清史稿》在表述八旗时，倒置、混淆等错乱现象比比皆是，这严格说是不正确的。《辞典》对此予以纠谬订误，加以规范。如《清史稿》第31册9295页（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，以下所引册、页皆同此版本）称珲津“隶蒙古镶蓝旗”，《辞典》则作“隶镶蓝旗蒙古”（见第2140页“珲津”条）；第32册9597页称刘芳名“汉军正白旗人”，《辞典》则作“隶正白旗汉军”（见第2504页“刘芳名”条）；第31册9240页称冷格里“满洲正黄旗人”，《辞典》则作“隶正黄旗满洲”（见第851页“冷格里”条），等等。这种对八旗隶属关系的清楚表述，传递了准确的知识，是《辞典》最值得称道的成就。

纠正官名、爵名之谬。《清史稿》中在表述八旗官名、爵名称谓时，颇为混乱，以后称代替前称，以前称代替后称，或前后称混用的现象，在在多有。《辞典》对此进行了某些纠正。如第44册13457页称崇德四年“骑都尉傅察，歿于阵”，骑都尉乃乾隆元年（1736）出现的世职之称，《辞典》表述为“牛录章京”（见第2029页“傅察”条）；第44册13461页称卓纳“太祖时来归，授佐领”，佐领乃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出现的官名，《辞典》表述为“努尔哈赤时归附，

授牛录额真”(见第 996 页“卓纳”条),等等。这类纠正虽未能全面铺开,仅是一小部分,但值得肯定。

纠正人物之谬。《清史稿》中有不少将人物,特别是人名弄错的现象,《辞典》对此亦有所纠正。如指出第 3 册 572 页嘉庆三年二月“以鄂奇泰为黑龙江将军”,鄂奇泰为“误名。应作那奇泰”(见第 2004 页“鄂奇泰”条);指出第 44 册 13354 页“西泠十子”中的陈子龙为陈廷会之误(见第 575 页“西泠十子”条),等等。还有对《清史稿》中一些人物之谬误,认真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,不予指出而径行改正者。如第 43 册 13145 页,有童能灵“年九十”之文,《辞典》乃采纳学界考证结论,指出其生卒年为(1683—1745),即卒年 63 岁(见第 2059 页“童能灵”条);第 32 册 9638 页,错书张缙彦为“河南新郑人”,则径改为“河南新乡人”(见第 1849 页“张缙彦”条);第 45 册 13850 页,错书顾祖禹“字复初”,释文径改为“字景范”(见第 2853 页“顾祖禹”条),等等。

纠正典籍之谬。《清史稿》中所列书名多有谬误者,《辞典》经核查多予指出。如指出第 15 册 4231 页所列徐时栋撰《山中诗学记》为误名,应作《山中学诗记》(见第 112 页“山中诗学记”条);第 15 册 4384 页所收方殿元撰《大谷集》,误,指出应为《九谷集》,因作者自号九谷,故以名集(见第 80 页“大谷集”条),等等。还有相当多的条目纠正了卷数之谬,虽细微繁琐,但传递的是准确的知识。

纠正各类名物表述之谬。如指出第 10 册 2484 页,所述文宗所定太庙正殿神祖位数之限为“五祖三宗”,有误,应为“三祖五宗”(见第 224 页“五祖三宗”条及第 52 页“三祖五宗”条);第 9 册 2361 页,称“嘉庆三年,升松桃为直隶厅”,有学者考证称三年为误,《辞典》采纳,遂谓“嘉庆二年(1797)升为直隶厅”(见第 947 页“松桃”条),等等。

纠正点校本标点之误。即《清史稿》本身无误,点校本标点错误而造成新的谬误亦予以纠正。如指出第 43 册 13207 页“孔广森,孔子六十八代孙,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”中,“孙”后的逗点为误加,这样便将本是孔子之 70 世孙,错成为 68 世(见第 364 页“孔广森”条);指出第 44 册 13457 页“护军校扈获、巴雅拉”之文中的顿号为误加,将本为一人的“扈获巴雅拉”变成了两人(见第 1814 页“扈获”条);发现第 44 册 13533 页有“步军统领、郎中”的行文中,顿号为误加,将本为一个官名的“步军统领郎中”,错误地变成了两个官名,遂加纠正,以正确表述(见第 1026 页“明善③”条)。

以上纠正《清史稿》之谬误总计起来足有千条之多。

(二) 弥补缺漏

《清史稿》不少表述缺乏必要的交代,以致本应明确之事物模糊不清,其中最突出的是所述人物多大而化之,明确标注出生卒年者少,或只有卒年而无生年,即使是声名籍甚者亦不例外。《辞典》多方搜寻,对不少有此欠缺的人物查出究竟。

补注爱新觉罗氏人物生卒年之缺。《辞典》依据《爱新觉罗宗谱》,对大量的宗室人物凡标明世系者,多能查明而标出生卒年。此外,还将无明确宗支可查的觉罗人物查出了底细,加以标注,如标注户部尚书觉罗朗球之生卒年(见第 2828 页)、标注刑部尚书觉罗雅布兰之生卒年(见第 2830 页),等等。尽管这仅是《清史稿》中所载觉罗的一部分,但也弥补了《清史稿》中爱新觉罗氏人物生卒年不详的缺漏,构成了《辞典》的又一大特色。

弥补诸多人物生卒年之缺。对《清史稿》中所收诸多没有生卒年,或生卒年有所欠缺的人物,亦广泛搜寻,做了补充。特别是对《文苑传》中许多记载颇为笼统的人物之生卒年进行标注,不仅对知名者如钱谦益、龚鼎孳、吴伟业、朱彝尊、万斯同、章学诚等加以标注,更将诸

多文士如陈恭尹、屈大均、梁佩兰、彭士望、林时益、宋琬、施闰章等皆予明确标注。当然不止于此，还将在《清史稿》中没有传略及其相关信息，而散见各处的声名不著者，亦尽力搜寻补充。诸如将《艺文志》中所列书名下的修撰者朱文藻、任其昌、赵学敏等均标明了生卒年。这些虽多抄自现成结论，但却弥补了《清史稿》的缺憾。

展示声名不著者之生平。如《辞典》还将仅出现在《艺文志》中书名下，而其他处没有任何身世背景交代者，经探幽发微，展示其生平大略。如阐释第15册4297页出现的蒋超、4314页出现的赵魏、4301页出现的林本裕、4337页出现的沈又彭等之生平事迹，皆作清楚展现。

（三）值得称道的释文

《辞典》还将《清史稿》中所载模糊之事物明晰化，其中对典籍及地名的释文较为突出。

不少典籍释文，颇有析疑考证功夫，追根溯源，阐发精义。或抓住要点，指出优长，如谓《曹州府志》曰“体例记述均尚简严，考据精审，订正前志，芟削虚谬，去其附会”（见第1693页）；“藏书纪要”条释文曰“此书详细论述收藏古籍之诸种技术。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古代藏书管理。为19世纪惟一论述图书馆活动之专书，对近代图书馆发展具有较大影响”（见第2660页）。或直指典籍本身之不足，如谓《宋诗纪事》“虽以纪事为名，而多收无事之诗，故不称诗话”（见第879页）；谓《诗经叶音辨伪》“大抵欲创建新说，凌跨前人。然取舍之际，已失是非之公，多有牵强之处”（见第2230页）。或客观揭示瑕瑜互见者，如谓《庸闲斋笔记》“足以增广见闻。惟文笔不清，叙述拙劣，考证粗疏”（见第1775页）；谓《陆堂诗学》“虽间有精核之处，然争奇嗜异，反掩其所长”（见第1866页），等等，皆有的放矢。

地名释文中多有翔实之阐释，尤在理清脉络，展示特色上颇下工夫。如“瑞洪，镇名。在今江西余干西北。该镇位处鄱阳湖滨，农副产品丰富。至清代仍为通往梅庄要地。清饶州府余干县丞、鄱阳湖营把总均驻此，至清中叶渐成饶州府重要集镇”（见第2138页）；“我未山，山名。位于今云南昭通东境。山五峰横列。当地少数民族语五为我，横为未，故名。”（第817页）等等。

综上所述，《辞典》取得了不少值得肯定的成果，是众多参与者辛勤劳动的结晶，这本应是编写好这部辞书重要基础和保证，是十分有利的条件。但令人非常遗憾的是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，可喜的优长淹没在混乱与谬误中而黯然失色，终成难以卒读的废品。

二、体例不一 编辑混乱

辞书应是最权威、最有典范意义的图书，除内容应翔实精准外，尤为重要者，当体例规范统一、表述明晰、概括恰当、逻辑周延、编辑严谨，这样方为合格之作。《辞典》却不然，它体例不一，编辑混乱，问题极多，毫无章法。

（一）收词与立目的混乱

错收错立与滥收滥立。作为一部专业辞典，该收、立什么词目，应有非常严格的原则与标准。《辞典》却没有明确的总体把握，随意而为，该收词不收，不该收而错收、滥收；当立目而不立，不当立目而错立、滥立，没有统一规范，造成全书杂乱无章。

打开《辞典》第1页，这种混乱情形即展示在读者面前。如该页有“一甲”的条目，称：“科举名词。殿试第一等。共有三名，赐‘进士及第’。第一、二、三名通称为‘状元’、‘榜眼’、‘探花’。”随后，第2页又有“一甲一名”之条，这与“一甲”条明显重复，但还有“一甲二名进士”（按，这里又多出“进士”二字，显见体例不统一）之条，还是重复。既收一甲一

名、一甲二名条目，当然也得收一甲三名之条，然而没有。按，上述凡进士具有名称者即加收录的原则，当然还得收称作“传胪”的二甲一名，然而也没有。再有，既收立“一甲”，当然也得收立“二甲”及“三甲”之条目，然而，仍然没有。这种有收有不收已属残缺不全；而既有“一甲”之条，又收“一甲一名”及“一甲二名”两条，皆属赘文。

第1页还有“一司”的条目，称：“政区名。玉树一司之简称，为清朝玉树四十族土司之一。”此为不当立为词条者，且释文亦错。一司，只是第一土司之意，非政区名，更非专指。以下又有“二司”（见第4页）、“三司”（见第41页）条，同样错误（如按撰稿者之本意，还应有“四司”，但却疏漏未载）。所谓“玉树四十族土司之一”，亦错。《清史稿》原书（第9册2467页）本明确指出“土司青海所属凡四十”，其中属玉树者，仅为四司，所谓玉树四十族土司者，张冠李戴之错解也。史稿同页，在标明“玉树四司”之同时，又有“阿拉克硕二司”、“札武三司”等表述，亦足见二司、三司绝非“政区名”，同样是表示数目之词。故将“一司”、“二司”等列为条目，并揣度释文，颇为荒唐。

《辞典》这种条目设置的混乱，在在多有。如除立“给事中”（见第2134页）、“都给事中”（见第1675页）、“六科给事中”（见第309页）外，又设立“礼科给事中”（见第2709页）、“工科给事中”（见第62页），却无吏、户、兵、刑四科给事中。其实，前列三个词条问题已经说清，再立礼、工二科给事中已属多余。缺失混乱，不一而足。

大量收录浅白语词为词条。《凡例》称，《辞典》收“难懂的字词”为词条，加以解释，实际上滥收严重，有很多十分浅显、一看即明的却收录并作解释，如：“不妨，可以，没有妨碍。”（见第230页）“水田，种植水稻的土地。”（见第356页）“壮士，意气旺盛之士，犹言勇士。”（见第889页）“京师，指首都。”（见第1127页）“葡萄，水果名。”（见第1955页）“园地，种植瓜果蔬菜的田地。”（见第2206页）等等，皆为日常通用之语，绝非阅读《清史稿》的障碍，这种浅显的词条不下数百，自乱体例，作为专业辞典甚不严肃。

当收不收，遗漏严重。《凡例》称，凡《清史稿》正文中所出现的人名、地名、名物等等均予收录，然而并未做到，而是条目不全，遗漏严重。仅以《礼志》所载为例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，追封孔子五代为王爵中的五个王爵之名称、群祀中所举雍正朝各地立祠庙尊祀者共13个封号或赐号，皆一律失载。此外，与无关紧要的语词一再立条、强做解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研究清史的重要词语却弃而不立。如《地理志》中府、州、县之下，常常标以“衝”、“繁”、“疲”、“难”、“简”、“要”、“倚”等字词，何义？如立为条目加以解释，应是最能体现《辞典》特色之处，也是人们读《清史稿》时最希望得到确解之语词，然而《辞典》却概付阙如。

条目设置中变通与拘泥交织的混乱。《辞典》虽规定凡《清史稿》正文中出现的名词，均予收录，立为词条，然而在特定语境中出现的名物，又不能原样照录立为词条，而应依据常规，加以适当处理，再立为条目。诸如一字县的名称，在《地理志》中总体说明时，有时只以一字出现，而无“县”字的后缀。本来，通常使用时，一字县名后须加一个“县”字，自古以来不论社会实践及往来行文皆约定俗成。在《辞典》中如“林县”（见第938页）、“绛县”（见第2134页）、“藤县”（见第2722页），这种变通的表述与立条方式正确。然而，实际上，又存在拘泥于《清史稿》不加“县”字、仅以一字出现者，如“青”（见第900页）、“郾”（见第1752页）、“鄞”（见第2307页），下面注明为“县名。”这既违反常识，又与变通处理之法相矛盾，属于明显的体例不一。

变通与拘泥交织的问题，在两字县词条的设置上也存在。两字之县名，按常识其下本不应

再加“县”字，如该书中的“天长”（见第174页）、“邢台”（见第701页）、“黎城”（见第2463页）即是。该书中还有怪事，不少两字县名之后也加上“县”字，否则不称其为县。如“江山”（见第671页）、“阿城”（见第1185页）、“舒兰”（见第2045页）等条目，释文中却排除“县名”的义项，仅称为“山名”，或“镇名”，或“人名”，也就是它们不作县名出现。只有在“江山县”（见第674页）、“阿城县”（见第1191页）、“舒兰县”（见第2046页）等条目的释文上，方出现“县名”的字样。

这种该加“县”字而不加，不该加“县”字非加上不可的现象，确实怪异，但究其实，乃撰稿人拘泥于《清史稿》原文而不知变通。这种不知变通拘泥不化的收词方式，仅所收地名之词条即不下600余条。一切悉依《清史稿》的表述也体现在许多其他类别条目上，体例不统一，造成了全书的混乱。

参见条设置的混乱。辞书中，一般条目设置有主条即正条、辅条即参见条之分。主条或称中心条，包括诸多内容或包涵诸多义项。往往这诸多内容或义项，又可以分别单列成单独的词条；或者主条又有不同称谓，亦可另立词条。为避免重复或遗漏，则设参见条以补充，即相辅相成之意。主条与辅条如何综合统分，参见条立与不立，或如何立，应通盘考虑，统一规划，以使全书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。对此，《辞典》缺乏总体考虑，相当混乱。

如第1640页，有“陕西省”词条，注明“省名。”以下详细介绍该省之概况，为主条；同页，又有“陕西”词条，注明“见‘陕西省’。”属参见条，是辅条。如此设置安排，恰当合理。然而，《辞典》中有关省区条目之设置，竟仅此一例。人们看到，《辞典》中虽有山西、山东、甘肃、四川、安徽等条目，解释为“省名”，并介绍其概况，然而却并无山西省、山东省、甘肃省、四川省、安徽省等本应作为参见的条目。同样，又有江西省、福建省、云南省、贵州省、台湾省的条目，但却无作为省名的江西、福建、云南、贵州、台湾的参见条目。虽然，《辞典》有“台湾”词条，但却是作为县名而不是省名出现的。以上诸端可见主条与参见条设置之混乱，应设参见条而不设参见条，重要词条明显遗漏。

再如，“信王，明宗室。明熹宗之弟，后金天聪元年（1627）八月嗣位，谥号庄烈帝。”（见第1319页）这是本应设为参见之条，即“见‘崇祯帝’”，在主条“崇祯帝”中，交代信王即可（实际上《辞典》1743页“崇祯帝”条中并无“信王”内容），却不作参见而独自成条，竟出现谬误。信王后来当了皇帝，就不应再说成“明宗室”；释文又说其已“嗣位”，这明明是嗣了皇帝位，但嗣何位却不加说明。不说生前，而说死后，即所谓“谥号庄烈帝”，这明明是指崇祯帝，却不明说，含糊其辞。又，明帝嗣位当用明朝纪年的天启七年，不当用后金纪年，如用只能在括号内标志。再如《辞典》“四贝勒”条，当与“信王”条属同类性质，然其释文并未称作“清宗室、大臣”，只云“见‘太宗’。”（见第476页）这就将主条与参见条区别开来（然而，仍有无着落的问题，详下）。此亦可见《辞典》条目设置及释文混乱不一。

还有虽设参见条，却无着落、无呼应之情形。如前举“四贝勒”条称：“见‘太宗’。”然而第232页“太宗”条里，却无“四贝勒”字样；第328页“方白耳氏”条称：“见‘汤若望’。”第1623页“通微教师”条，亦称：“见‘汤若望’。”查“汤若望”条（见第2089页）释文，却不见“方白耳氏”及“通微教师”字样；第776页“更庆”条称：“参见‘登科府’。”而“登科府”条（见第2125页）释文，并无“更庆”内容，等等。竟使参见无着落。《辞典》中有些虽未标明参见字样，但应彼此呼应，却无着落者。如第2719页“聂光”条称：“本名聂先，史稿误先为光。撰有《续指月录》。”第2860页“续指月录”条称：“书名。清聂光撰。”前已订正，此又退回到谬误，两条竟不能协调呼应。

（二）行文的混乱

概括语无统一规范，表述不一，自相矛盾。凡词条都应有标明定位的概括语，概括语必不可少，《辞典》之概括语却缺乏统一规范，相当混乱，在人物词条方面尤为突出。人物的概括语即称谓是对人物身份地位的判断，应该划定大致范围，清楚确切，简明划一，宜粗不宜细。然而《辞典》分得极为繁琐杂乱。

定性概括语标志中，相同性质之词条却有差异甚大之释文，漫无标准，随意性强，甚至自相矛盾。如同为人妻，或曰“民妇”，或曰“民女”。如第171页，共有为人之妻妾者7个条目，称“民妇”者4条，称“民女”者3条。类似例子不胜枚举，遍布全书。按常理判断，已婚者称民妇，未婚者称民女。现在面对皆为人妻者或称“民妇”，或称“民女”，无乃自造混乱。更怪异的还有第1506页：“马雄镇妾刘，清朝民妇。”“马雄镇妻李，清朝官妇。”同为一人的妻与妾，妻是“官妇”，妾竟是“民妇”！

再如称绿国安为“清朝叛臣”（见第2563页“绿国安”条），绿氏为清朝打天下奋斗了一生，是清初著名将领，只是晚年偶一失足从孙延龄之叛，便判定为“叛臣”，无乃偏颇之甚。还有，同一属性却有不同定性语者，如：同为清朝将领的潘龙、潘瑀及潘永禧，潘龙因随吴世璠叛清、潘瑀因随王辅臣叛清，其定性语皆为“清朝叛将”（见第2548页“潘龙”条及“潘瑀”条）；而潘永禧虽随金声桓叛清，定性语却是“清朝将领”（见第2549页“潘永禧”条）。事一处异，自相矛盾，无划一之标准，皆属随意而为者。

封爵称呼的混乱。清代有大量的封爵，特别是藩部封爵，代代承袭，人数众多。《辞典》人名后有一定性概括语之惯例，按理说均称为贵族，或均称为勋贵，或均称为勋臣，亦未为不可，因皆大致符合其身份。但问题是，很多情况下又称为王公。称公爵以上者如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及公为王公，名副其实；然称台吉、塔布囊亦为王公，则不正确。如第639页上，称为“王公”者共有11处，其中7处名实相符，正确；4处却是台吉，不正确。这种无规范之表述者不下200处，足见其混乱。

皇帝称呼的混乱。在严谨的辞典中，不论对任何人物的称谓，均应用其本名。然而《辞典》称述皇帝时，虽然也有仅用其本名者，但不多见，大量使用的却是庙号，全书使用庙号者多达1000余处。或年号后加“帝”字的表述方式；或者庙号、本名、年号再加“帝”字等交叉混合使用，颇不一致。还有称述皇帝只用年号，如称乾隆帝弘历为“乾隆”（见第258页“日知荟说”条）、称道光帝旻宁为“道光”（见第1515页“恩崇②”条）、称同治帝载淳为“同治”（见第708页“孝哲毅皇后”条）等等；这在辞书中使用是不严谨、不科学的。

八旗称谓表述的乱象。本来纠正《清史稿》中八旗表述之谬，是《辞典》的一大特色。然而，由于编辑的混乱，竟使得这一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大打折扣：在纠正谬误的同时，对八旗称谓错乱的表述仍然存在，如“王世永，隶汉军正红旗”（见第148页）、“洪承畴，隶汉军镶黄旗”（见第1365页），等等。《辞典》中这类错误不下百条。

释文彼此重复或抵牾。缺乏总体把握，释文前后矛盾，彼此不呼应，竟视而不见。如第24页上有相邻的“八旗兵”及“八旗制”两个条目，然释文不同。前者所述八旗名称错误，因非为当时之称，而后者所述却是当时之名称。第645页有两条释文：“行饷，官兵在行军、出征时发放的粮饷。亦称‘行粮’。”“行粮，政府给运输漕粮军人发放之粮饷。”显见，前者之解释正确，而后者为谬解。第2183页“杨树烈”条称“顺治十八年吴三桂叛清。”次页“杨应鹗”条则作“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清。”相邻之条，对同一事件，一错一对，任其存在。

释文中义项排列无序，随意而为。当某一词条有多个义项时，应有个顺序，特别是时间顺

序,应井井有条,此乃常识。然而《辞典》却无此规矩,混乱无序。如第341页人名“巴图”条共11个义项,排列的次序是:(1)道光六年袭爵、(2)道光八年袭爵、(3)康熙五十八年袭爵、(4)康熙四十二年袭爵、(5)乾隆二十一年袭爵、(6)康熙三十一年袭爵、(7)顺治十三年袭爵、(8)道光二十五年袭爵、(9)康熙十六年袭爵、(10)康熙三十四年袭爵及(11)乾隆十五年袭爵,可见时间排列之颠倒混乱。这种颠倒无序之排列,在《辞典》中不下200条。

冗繁的赘文。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:

清朝年号之前一再加“清”字。本是有关清史之辞典,释文中所提清代年号,按常识都不会理解成其他朝代,故其前不应再标以“清”(或“后金”)字样,《辞典》却有时加有时不加。通观全书于清代年号之前加“清”字时居多,且于一条释文里,不厌其烦地加“清”字。《辞典》中这类赘文不下1100处。

已标明生卒年,文末再言卒于何年,乃至卒年多少岁。因此而造成重复者甚多。《辞典》中有此相同毛病者,不下600条。如“戴钧衡(1814—1855),吐血卒,不足四十岁。”(第2657页)明明42岁,或已41周岁,怎说不足40岁?不仅体例不合,且计算错误。

多余之注。爵称中多余之注。清代的职官名称与封爵名称,同历代的官爵名称一样具有鲜明的时间性,即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称谓,只要准确无误地说出不同时间段里官爵之名称即可,这是常识。然而《辞典》却画蛇添足,加一些不必要的解释。如“巴锡,康熙三十一年(1692)袭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。今汉文改为一等男。”(第342页)“班达尔沙,康熙十八年(1679)袭为一等精奇尼哈番。今汉文改为一等子。”(第1425页)等等。《辞典》中“今汉文”这类赘文之词条,不下200处。

无关的堆砌。作为清史专业辞典,释文皆应围绕清史,然而《辞典》中不少释文却将与清史无甚关联的东西充塞进来,其中最为突出的,莫过于地名与典籍的赘文。

作为清史辞典中的地名释文,只要交代清楚其所属地域、行政区划及在清代的沿革足矣。《辞典》却不然。或大讲历史沿革而不言及清代,诸如释归德府(见第2744页)以大篇幅历数由西周至明的沿革,却不讲辖县;释舞阳县(见第2340页)繁琐介绍历代演化,却不讲其治下区划,其在清代之情况,皆只字不涉及,实为重大缺漏。或详细描绘景象,诸如描绘佛光山(见第838页)、君山(见第886页)、覆釜山(见第2724页)之景象;或记传说掌故,诸如大讲尼山(见第537页)、侯山(见第1321页)、神居山(见第1391页)之历代传说;或大讲物产特产及名胜古迹,诸如详述奉化县(见第897页)、青州府(见第903页)、苏州府(见第2775页)之丰富物产与众多名胜,等等。上述诸端,或脱离了清史的范围,或与清史无关。有这类冗长赘文者,多达2200余条。

典籍释文中,或繁琐叙述卷帙内容,诸如在《武夷山新志》(见第918页)、《刻楮集》(见第1131页)、《秋水斋诗集》(见第1307页)释文中,详细罗列书中内容乃至人名、篇名,甚至每卷诗篇有多少数目,类似者不下1200条;或繁琐罗列版本,几乎每部典籍都有版本介绍,仅罗列3种以上版本者即达300余条;或繁琐介绍著录情况。如某种典籍已佚,不妨列举曾著录之书,以证明其曾经存在。然而,某典籍赫然存世,仍言其为某某所著录者,足有200条;或繁琐列举典籍之现今藏书单位,尤有甚者是叠床架屋,即先罗列收藏单位,再说此书已收入某某丛书之中,诸如《杜韩集韵》(见第723页)、《寄园寄所寄》(见第1812页),等等。以上这种不厌其烦地列举现今藏书单位的释文,《辞典》中不下300条。

不当的滞后表述。作为专业辞典,本应站在学术前沿,捕捉并及时传递最新学术信息,以增加学术含量。《辞典》的典籍释文旁征博引,却给人以严重的滞后感,即目光所及,多为过时

的事物，前沿者难进其视野，凡言及版本（其实在一般情况下，实在没有必要），多为老版本、旧版本，较少言及最新版本，诸如介绍清史常见多用之书：《石渠余记》（见第431页）、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（见第594页）、《南略》即《明季南略》（见第1245页）、《梅村集》（见第1698页）等等，皆为老版本、旧版本，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版本，仅此即不下百条。

还有不了解世事之变化，仍停留在过往。典籍释文中所列藏书单位一再提及北京图书馆，但今已无此名称，早在该《辞典》出版的前十年，即1998年已更名为国家图书馆，这是文化学术界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，《辞典》对此竟茫然不知，提及北京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分馆之处足有百条之多。如此种种，皆可见《辞典》之滞后，传递错误学术信息。

（三）体例不当的混乱

体例乃著作的编写格式、内容规定与组织形式，是全书撰写所遵循之依据。如体例周延细密，则著作内容充实完整，条理清晰，逻辑性强，成为浑然一体之书；否则，就会产生各种问题。一些问题与谬误的出现，恰恰是由于所定体例不当所导致。

有关语词的不当体例及后果。《辞典·凡例》中规定将《清史稿》一书中所出现的“成语、典故、谚语”，收为词条，且没有限制语。如此，这部专业辞典无疑将成为一般的语文辞典。而实际上确是如此。诸如将不少常用的成语亦加收录、解释并引证，如：不毛之地（见第231页）、文过饰非（见第320页）、利令智昏（见第815页）、络绎不绝（见第2134页）等等，充斥全书，把《辞典》搞得不伦不类。故此体例不当之甚。

有关地名释文的不当体例及后果。《辞典·凡例》中指出：“地名释文中，重视历史沿革，兼述山水形势”。这就使地名释文把重点放在历史沿革、山川景象，而忽略应写的清代地理沿革，喧宾夺主，造成地名释文中无关清史的赘文大量充斥。而所谓兼述山水形势，实际上多为无关紧要的风光景象，且随意而为，毫无规范。曾发生过重要事件的地方如吉林崖、青山关、一片石、潼关等山川关隘之特有形势，却皆付诸阙如。故此体例亦不当之甚。

三、谬误充斥 是非混淆

以诠释《清史稿》为手段的清史辞典，其首要任务必须指出和纠正《清史稿》本身所存在的诸多谬误，随之精准阐释清史知识，挖掘清史要义。《辞典》却不然，它虽然对《清史稿》的谬误做了某些纠正，然而仅是一小部分，且极为不力，其诸多谬误不仅未能纠正，且大量加以延续，更多有荒诞离奇的谬解，以致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弄错弄混。结果非但未能解疑释惑，反而散布了更多的谬误。

（一）史实错误

史实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、存在过的事，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改变性，真实、准确是其灵魂。所以复述它，只能如实精准，绝不能模棱两可，似是而非。没有对历史的清楚确切了解和深入研究，就把握不了历史的真谛，分辨不出历史的实情。特别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面前，将无所适从，一片茫然。很遗憾，《辞典》正是在一片茫然中解释历史，故违背史实的错误大量存在，颠倒混淆之谬误可谓遍布全书。

史事悖谬之错。或张冠李戴：

如称顺治帝于顺治十三年，南巡至苏州时，以不法罪杖杀三遮和尚。（见第43页“三遮”条）大谬。顺治帝从未南巡过，往南行走最远不过至南苑，不出京师百里，何有南巡之事？这是误解李森先巡按江南为南巡，造成此笑话。

“孔允植，孔子六十五世孙初名。后避清帝讳改名胤植，又改名荫植。”（见第361页）“孔荫植，孔子后裔，初名允植。”（见第363页）两条释文皆错，其实胤植乃本名，允植、荫植皆为避雍正帝胤禛讳，死后被追改者。竟不清楚避哪位清帝之讳，避其何讳？遂犯此常识性错误。又，孔允植与孔荫植实乃同一人，即孔胤植，不当分别各立一词条，应立主条及参见条。

称1645年明朝义士吴应箕“起兵响应金声桓反清，兵败被俘杀”。（见第806页“吴应箕”条）错。金声桓反清归明是顺治五年，而吴应箕起兵响应金声桓抗清被俘遇害，是顺治二年。此将金声误认为金声桓，完全弄错。

称御史桑芸“顺治二年被李森先弹劾革职。九年起用补原官”。（见第1625页“桑芸”条）错。这是误读《清史稿》（第32册9617页）造成的错误。桑芸本来与李森先一道弹劾冯铨贪赃枉法事，而遭到摄政王斥责。被革职，后被起用的是李森先，而非桑芸。事实是李森先弹章上后，更被认定言词过苛，而遭革职惩处，直到九年方获起用，此事《清史稿》表述清晰，《辞典》却错安到桑芸身上。

称明朝武将杨腾于“万历二年（1574）驻守于沈阳附近邓良屯。曾执杀建州女真首领王杲。”（见第2170页“杨腾”条）错。杨腾仅参与攻破王杲寨，使之溃败，并未执杀王杲。王杲是第二年（1575）逃入哈达部，被该部首领王台（万汗）执送京师而遭磔刑者。

第2233页“靖江王”条称：“明末藩王。名朱亨嘉。清顺治七年被清军孔有德部所杀。”错。朱亨嘉已于顺治三年被南明官员械至福州隆武帝处，旋被杀。此被孔有德所杀之靖江王乃亨嘉兄弟朱亨歆。另，此靖江王词条应设两个义项。

第1708页“盛京总管，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。乾隆十七年设，由盛京将军兼。掌盛京三旗包衣之政令，并管理盛京陵寝、粮庄、果园、放牧等事。”错。这是将盛京总管与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混为一谈。盛京总管本是顺治元年八月清迁都北京后，镇守盛京地区的留守大臣，与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是两回事。

或臆造荒谬：

称明朝大臣沈廷扬“及南都陷，航海至舟山，福王授兵部右侍郎。”（见第864页“沈廷扬”条）错。南都既陷，弘光朝便不复存在，何“福王”（弘光帝）之有？

称田雄于“顺治二年（1645）率部归附。三年五月复擒献明福王。”（见第465页“田雄”条）错。田雄已于二年五月，劫献弘光帝降清。何三年五月“复擒献”之？

称“绍兴”为“南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所用年号。元年（1645）为顺治二年。”（见第1903页“绍兴”条）错。凡称帝建元方有年号，所谓监国，即太子或臣下暂时监理国事、执掌国政，何有年号？鲁王监国从无年号。又鲁王监国元年是顺治三年，非为二年。

称“肇庆”为“南明桂王朱由榔政权初用年号。行三年，元年为顺治三年（1646）。后改用永历。”（见第2416页“肇庆”条）错。朱由榔称帝建元只有一个年号即永历，并无其他年号。永历元年是顺治四年，非为三年。又，所谓南明桂王朱由榔，亦错，应是南明皇帝朱由榔。

或缺漏错乱：

“侯峒曾，抗清义士。明亡后，继续抗击清军。顺治二年为左通政，城陷，挈二子赴水死。”（见第1322页）此条错误与混乱交织。既言继续抗清，则其先前应有抗清经历，但于何时何地，此时又于何城抗清？皆未交代。好像抗清后官左通政，此官被哪一政权任命？更令人糊涂。其实侯明亡前并无抗清事，于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始为弘光朝任命为左通政，然乡居，未赴任。次年，即弘光元年（顺治二年）六月，清兵下江南时，被嘉定民众推为首领，遂率众据城抗清。

称函可“顺治初自广东回乡，所带经笥中藏有反清文字，被守城清军拘捕。后流放于东

北。”（见第1184页“函可”条）谬说，且时间、地点皆含糊不清。其家乡就在广东，从广东回乡之说谬甚。所谓守城清军事，何城？后，又是何时？应是“顺治四年，自南京返回广东时被拘捕。次年即顺治五年，流放沈阳。”

“李怀信（？—1620），明朝将领。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奉命充援剿总兵官，守沈阳，败敌有功。翌年守辽阳，与后金军战阵亡。”（见第765页）错。所谓守辽阳，乃照录《清史稿》之误。据《明史》李怀信本传可知，李已于1620年“引疾”离辽而去，并未参与后来守辽阳之役。且《清史稿》亦未言李阵亡事，写阵亡乃《辞典》撰稿人之揣度。又，辽阳陷落在1621年，非1620年。实际上，李离开辽东后，于天启二年（1622）已任大同总兵，后卒于家。《辞典》既未能纠正《清史稿》之错，又加入想当然的成分，错上加错。

“张电臣，淮安府吏，顺治中坐侵蚀漕折银一百二十两有奇，例当追比，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森先疏请缓之。”（第1845页）错。此照录《清史稿》之误。非例当追比，李疏请缓之，真实情况是“已追比清完，李疏请从宽处理”。

《辞典》中上述这类的悖谬史事不下400条。

制度理解之错：

对官爵制的谬解。众所周知，清朝典制之因革变化颇为复杂，其官名、爵名，乃至衙署名，不同时期有不同之称谓，必须严格注意区分，不可混淆。这是治史者必须遵循的原则。以后来才有的名词指称以前之事，或用以前之名词指称后来之事物，都是不正确的。《清史稿》在这方面的问题甚多，表述颇为混乱。如前所述，《辞典》对此有所注意，并进行了纠正，然而仅是一小部分，大部分情况却是对《清史稿》的谬误照抄不纠，官名爵名表述混乱之错误大量出现，传递了错误的历史信息。

如“席赉，顺治元年授拜他喇布勒哈番”（第1572页）、“柯永蓁（？—1685），顺治十三年擢都统”（第1264页）、“七复，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，袭二等子”（第16页），等等。上述释文中，所列举的官与爵之名称皆错，错在其人获授官与授爵时尚无其称。如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乃顺治四年所定；都统是顺治十七年所定；子爵则是乾隆元年所定。显见这些都是以后称代替前称，不合史实。然旧称已被新称取代，仍继续使用之亦不对。《辞典》亦不乏其例，如：“塞白理，乾隆初，封三等阿思哈尼哈番。”（第2257页）阿思哈尼哈番，乾隆元年已定称为“男”爵。官职与爵位之称时间概念十分明确。严肃的史学著作，尤其具典范意义的辞典必须审慎对待，不可有任何疏忽。在《辞典》中，这类官名、爵名称谓混淆颠倒的错误，竟达700余处。

其他有关官爵方面之谬解亦累累可见，如谓：“左都御史，官名。原称承政。顺治元年改承政为左都御史。”（见第409页）以偏概全，错。此两处承政皆应作“都察院承政”，不加“都察院”，错。本来，清入关前的天聪五年设六部，及崇德元年设都察院之长官皆曰承政。入关后顺治元年改六部承政为六部尚书，而改都察院承政为左都御史。《辞典》暗于此制度，言之谬也。称尼堪“顺治五年封和硕多罗敬谨郡王”（见第537页“尼堪②”条），错。从无和硕、多罗连用之例，亦从无和硕郡王，只有多罗郡王。称多尔袞于天聪二年“晋固山贝勒”（见第660页“多尔袞”条），错。清入关前的早期封号中有和硕贝勒之称，后取消。但从无固山贝勒之称。后来皇子定封，有和硕亲王、多罗郡王、多罗贝勒及固山贝子等称，亦无固山贝勒之称。此所谓固山贝勒，乃杜撰之词。称雅布“袭简纯亲王”（见第1982页“雅布”条），错。“简亲王”为封号，可以承袭；“纯”乃赐予专人之谥，向无承袭之例，故“纯”不可承袭。称赫图为“清八旗闲散官”（见第2299页“赫图”条），错。闲散，即八旗中未当差、未任官职者之谓，加“官”字错。“觉罗，清朝皇族。清太祖努尔哈赤叔伯兄弟及其子孙后代，即肇祖、兴祖、景祖

之后裔称觉罗。”（见第2827页“觉罗”条）错解。应作努尔哈赤父塔克世之兄弟及叔伯兄弟及其子孙后代。所谓“肇祖、兴祖、景祖之后裔称觉罗”，尤为荒谬。因肇祖、兴祖、景祖之后裔中既有觉罗，亦有宗室。而塔克世的子孙后代亦是肇祖、兴祖、景祖之后裔。

对兵制的谬解：“三旗包衣骁骑营，由正黄、镶黄、正白三旗兵丁组成。”（见第58页）清制，由皇帝自将的上三旗排列顺序是：镶黄、正黄、正白。此常识，表述不可颠倒。称曹玺为“隶正白旗汉军。内务府包衣”（见第1689页“曹玺”条），错。汉军与内务府包衣是两个概念。内务府包衣属八旗满洲，即八旗满洲中的汉姓人，不隶属于八旗汉军。曹玺乃正白旗包衣汉姓人，不隶正白旗汉军。

“噶喇昂邦，误名。漏依字。应为噶喇依昂邦。满语意为统领。”（见第2457页）非为误名。这只不过是它的另一种称呼或写法。这是噶布什贤营即八旗前锋营的最高长官之称。有多种称呼，汉译音亦有多种写法，诸如：噶布什贤噶喇依按班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、噶布什贤噶喇额真、喇喇依章京、噶喇额真、噶喇昂邦、噶喇按班、喀喇昂邦，等等，均属正确。当然，这是顺治十七年以前的称呼，十七年后称前锋统领。所以，所谓满语意为统领，亦错。因为除前锋统领外，还有护军统领，而护军统领则有另外的满语名称。

对科举制的谬解。称会试“取中者称进士，第一名称会元。”（见第2217页“会试”条）又谓“举人经过会试，合格者为进士。”（见第319页“文进士”条）均错。实际是，举人经过会试，合格者为中式举人，为贡士，其第一名虽称会元，但不是进士。凡贡士经殿试后，赐出身者方为进士，其第一名称状元。

“程可则，顺治进士。”（见第2020页“程可则”条）错，程可则，虽为顺治九年会试第一名，即会元，然旋因被指试卷“悖戾经注”，而被除名。此事《清史稿》（第12册3152页）记载明确。所谓“除名”，即除去名籍，取消原有身份，丢掉了继续参试的资格，被排除在殿试之外，与进士无缘，何来进士？事实上，程可则终生之身份只是举人。

“知贡举，主持进士考试之官员。清朝会试之知贡举从一二品官员中选拔，专管考试事宜，不管评卷、录取。”（见第1049页）释文混乱，错。录取进士考试曰殿试，主持者乃为皇帝，中式者由皇帝钦点，“恩赐”为进士。知贡举，仅是总管会试考场事务的监考官，由礼部侍郎充任。而侍郎是正二品。这是将会试混同于殿试，将贡士与进士混为一谈所致。

“陈演，天启间进士，任庶吉士，授编修。”（见第1872页）非“任”而是“改”或“选”。新科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者，称为庶吉士。庶吉士学习其间无禄入、无职责，属学员非官员，故不能称之为“任”。学习期满，即散馆时，考试合格，方得授官任职。

“金殿撰，本名金榜。因清朝凡一甲一名，授职为翰林院修撰，故有金殿撰之称。”（见第1087页）此似是而非，似乎金榜又名金殿撰，错。殿撰乃明清时期状元之别称。《清史稿》原文作“金殿撰榜”（第46册13976页），实即“金状元榜”，或“状元金榜”。“金殿撰”即“金状元”，很显然这不当立条。如立条目当立“殿撰”，而《辞典》缺漏不立。同理，“戴庶常”亦不当立为条目，然而《辞典》第2656页却立为条目，同属荒谬。

人物混淆之错。暗于史事，懵懂写史，有时将一人写成数传。

第326页有“方孝标，清朝文士，字元成。”第328页有“方悬成，清朝官吏。”未弄清二人实为一人：方玄成，字孝标。后避康熙帝玄烨之讳，以字行，遂改玄成为元成，或作悬成。第1478页之“夏成德”与1479页之“夏承德”，实为一人，即崇德七年献松山城降清的明朝副将，后被授三等昂邦章京的夏成德（承德乃成德之误笔）。但两条均有错误。“夏成德”条云，他是顺治元年降清的。“夏承德”条云，他被授“三等参将”这一从未存在过的级别，尤为荒谬的是

一百多年后，其人还在：“乾隆初，封三等子。后病卒。”再如莽古济一人有三传，劳亲（楼亲）一人有两传，且均有两个卒年，等等。

年代混淆之错。作为辞典所有表述都应科学精准，来不得半点不确切。《辞典》于这方面的问题甚多。其年代、时代的观念颇为模糊，随意而为，错乱颠倒的现象随处可见。计有：

时代与年代的混淆。对后金与清等历史概念模糊不清，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。如称后金天命、天聪年间为“清”：“天命四年（1619）清军征明铁岭。”（见第340页“巴克”条）；还有“清天聪五年（1631）”（见第1855页“参政”条）之字样。崇德改元后，国号已为清，仍称为“后金”：“崇德元年（1636）五月，归后金。”（见第1049页“垂班”条）；等等。甚至将后金前伸到其未出现之时：“罗科，后金时佐领。女真董鄂部。”（见第2788页）悖史之谬！此事发生于甲申年（1584），即后金建立前之32年，何来“后金时”？而佐领乃是顺治十七年以后之名称。《辞典》中这种年代混淆之错者，不下200条。

年代错误者处处可见。“户部，顺治五年（1631）始设。”（见第334页“户部”条）错，应是天聪五年（1631），顺治五年应为1648年。“苏泰太后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福金。天命十年（1625）林丹汗死，所部内乱。崇德八年（1643）清军多尔袞略其地，乃与子额哲献玉玺降清。”（见第2779页）未搞清史实，两个年代皆错，皆应为后金天聪八年。“甲喇额真，顺治八年（1651）定汉名为参领。”（见第464页）错。应是顺治十七年定汉名为参领。此类年代标错不胜枚举。更有年代标注错得离奇，如：将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官定海提督的祝廷彪之生卒年标注为“（？—1674）”（见第1393页“祝廷彪”条）；将顺治元年降清的吴惟华的生卒年标注为“（？—1868）”（见第802页“吴惟华”条），这样，其年龄已在200岁开外；又如死于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的王无党，竟是“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武进士，乾隆元年署贵州提督”（见第162页“王无党”条）；等等，可谓荒诞！本书中这类年代错误者不下200条。

事件混淆之错。本来咸丰十年（1860）的英法联军侵略北京，与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的八国联军侵略北京，是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两件事情，区别明显。然而，《辞典》却将两者混为一谈。如第2738—2739页中有8个“双”字开头的条目共12个义项人物，其实皆是光绪二十六年抗击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殉国的八旗员弁。12条释文正确的仅3条，竟有9条错误，这9条皆标明该员弁之卒年为1860，其中4条称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遇难，是明显把事件记混；1条虽然已标明1860，却称这是“光绪二十六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”！而另3条已标明1860年的，却皆称是“八国联军入侵北京”！可谓颠倒混乱。正确与错误同出现在一页之内！

（二）观点错误

作为辞书应以客观公正之态度，不偏不倚，如实表述，善恶直陈，否则便会失真。《辞典》却多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，以错误观点观察处理事物。故给人之感觉，此书犹如清遗老之作。

美化封建统治者。作为辞书，凡言人物，无论其身份地位，皆应直呼其名，以现真相，这是起码的规范。如前所述《辞典》凡称清帝处，多用庙号而不称其本名，以示尊敬。且不止如此，更以陈腐的语词状写帝王之行为：凡皇帝之行动多半曰“幸”、“驾幸”、“巡幸”、“临幸”、“驻蹕”、“崩”、“薨”等等；公主出嫁则曰“下嫁”；娶公主则曰“尚主”、“尚郡主”、“尚县主”，等等。

避讳字的照旧使用。清统治者为加强帝王之神圣尊严，大搞避讳字。《清史稿》对此虽然做了如实反映，但却背离了历史真实。《辞典》本应在指出其避讳后，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，不应再搞避讳。实际上并未如此，不仅一如《清史稿》避讳如常，且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最突出的

莫过于对雍正帝胤禛避讳之表述。如康熙年间故去的王士禛，士禛本是他一生中使用的名字，即本名，但死后因避雍正帝之名讳，被追改士正，乾隆间又被改为士禛。这皆是被强加的名字。按常理说《辞典》本应审慎对待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，即将王士禛作为主条，而将王士正、王士禛作为参见。恰恰相反，《辞典》却将讳改之名王士禛作主条（见第142页），将其本名王士禛作参见条，而遗漏了王士正。随之，竟习惯于避讳而不能自拔，弄出了笑话。《清史稿》因编纂体例混乱，在大搞避讳时，有时又不避讳。虽然王士禛本传（第33册9952页）中皆以避讳字王士禛出现，但在《部院大臣年表》中，特别在《艺文志》中数十种书名下之撰写者皆明确标识为王士禛，《辞典》释文竟视而不见，除有一处漏笔，即“池北偶谈，王士禛撰”（见第681页）外，其余皆习惯于避讳，一律作王士禛。如“分甘余话，清王士禛撰。”（第294页）“香祖笔记，清王士禛撰。”（第1305页）等等。《辞典》中凡以“王士禛”之名出现者共60余处。这种习惯于避讳不能自拔，竟发展到分辨不清什么该避讳，什么不该避讳，以致达到绝对不应避讳也避讳起来的混乱地步。按理说，雍正帝本人之名字当堂而皇之地大书特书才是。尤为怪异的是，《辞典》竟然将其名字也写错，凡涉及“胤禛”之处，书写正确如“高宗，清世宗胤禛第四子”（见第1562页）的没有几处，大部分却一着笔便条件反射般写成“胤禛”。如“弘晖，世宗胤禛第一子。”（见第541页）“孝经集注，清世宗胤禛敕撰。”（见第707页）等等，将雍正帝自己和自己避讳起来，荒唐可笑。《辞典》中本应作“胤禛”而错成“胤禛”的竟达50余处。

美化清人行动。《辞典》凡表述清朝、清军、八旗、满洲等等，多用赞美、肯定甚至崇敬之词，如其骚扰、攻掠明朝，进攻女真诸部，乃至朝鲜，多用“征”、“伐”、“讨”之类字样。而在此诸多行动中而死者，则用“阵亡”一词。如：天命七年纳尔察攻沙岭“阵亡”（见第1644页“纳尔察”条）、顺治元年阿喇穆追击农民军“阵亡”（见第1194页“阿喇穆”条）、同治三年托克托奈追剿回民起义军时“阵亡”（见第590页“托克托奈”条），等等。仅清官兵因对抗辛亥革命而死，用“阵亡”、“殉难”、“死难”等词，即不下300处。

甚以清人自居。凡表述外界与后金—清等之交往，则曰“来朝”（见第346页“巴图赖”条）、“来归”（见第263页“中后旗”条）、“归降”（见第396页“古鲁思辖布”条）、“来贡”（见第352页“巴斯琿士谢图”条）、“入贡”（见第398页“古录格楚虎尔”条）、“进贡”（见第472页“西洋毡”条），等等。

散布伪史。“李时荫，明末官员。顺治元年因为假冒明太子作伪证，被斩。”（第752页）“常进节，原明朝太监，降清后仍为内监。因附会伪明太子，被斩首。”（第1721页）“杨玉，原为明太监，将自称明太子之刘某，引入故明嘉定侯周奎宅，下法司勘问为伪，玉等引进者十五人被斩。”（第2166页）三人为同一事件，所谓假冒明太子作伪证而死，是清统治者强加之罪，是被清官方篡改的历史，孟森先生早有精辟考证，指出杨、常、李等人实是为证实太子为真而被杀。（《明烈皇殉国后纪》，《明清史论著集刊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）《清史稿》站在清官方立场上写伪史，《辞典》未能留心与掌握业已澄清的关于清史疑难问题的学术信息，亦沿袭错误。

再，“吴达济，朝鲜官吏。官弘文馆修撰。尝劝朝鲜国王背弃与清朝所定盟约，仍与明朝通好。崇德二年，献给清军，旋被杀。”（见第803页）这又是因袭《清史稿》错误，散布颠倒黑白的伪史。早在此十年之前，皇太极曾与朝鲜国王签订所谓“兄弟之盟”，后皇太极突然称帝，显然是要单方改变已有的兄弟关系为君臣关系，此乃“败盟”、“渝盟”之举，朝鲜奋起抗争，乃站在理上，清方明明理亏，反将“倡议败盟”的罪名强加于朝鲜，并借此发动战争，诛杀坚持正义的朝鲜大臣，吴达济便是在这一事件中挺身而出，为国分忧，慷慨遇害者。《辞典》暗于这段历史，不加辨识，而传播谬误。

将溥仪退位后所颁谥典，即对 1912 年后而死的一些遗老之谥号，加以书写，如称世续“赠太师，谥文端”（第 385 页）、伊克坦“谥文直”（第 634 页）、张勋“谥忠武”（第 1824 页）、锡良“谥文诚”（第 2616 页），等等。此时清朝已经灭亡，溥仪的复辟举动已与清史毫不相干，《清史稿》加以记载荒谬之极。此事当年即被批为“书伪谥、反民国”（《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行政院文（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）》，见许师慎编《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》，1979 年，台北，上册第 230 页）。《辞典》照书不误，实是散布伪史。

不承认南明政权。站在清朝立场，不承认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历等政权的存在，多数情况下将此三朝及三位皇帝，称之为福王、唐王、桂王。诸如：“丁魁楚，南明福王时，督两广。桂王立，授东阁大学士。”（见第 14 页）“彭期生，南明官吏，唐王朱聿键执政，官太仆卿。”（见第 1918 页）等等，《辞典》有如此称谓者不下 200 条。

（三）行文错误

交代不清与残缺不全。一部辞典由诸多词条汇集而成，每一词条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将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阐释清楚，即以明确的语言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。这就应清楚提供相关要件，做明了的阐释。《辞典》中却有相当多的释文遗漏关键内容，造成严重残缺，以致模糊不清，甚至产生歧义。

“王玉廷，清朝将领。在督战志官屯时受伤阵亡。”（见第 146 页）何时之人，于何时、何地、参与何战役，皆未交代清楚。这里唯一提及的地点志官屯，却是老官屯之误，且不知在何处。此释文是读错《清史稿》（第 36 册 11013 页）而致。从其本传可知，王玉廷于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从明瑞参与进攻缅甸之役，于老官屯中枪负伤。十二月，复往督战，创发而卒。

“方士衍，方国安之子。顺治二年方国安欲攻杭州，清军副将张杰、王定国率部抵御，方士衍被斩杀。”（见第 324 页）欲攻杭州乃是未付诸行动者，何来抵御？士衍在哪里、又被谁斩杀？均未交代。且此条之主语是方士衍应是主动方面，而不见其行动，却有方国安、张杰与王定国之行动，喧宾夺主，主动方成了被动方，不当之至！这是读错《清史稿》（第 31 册 9486 页）导致的一笔糊涂账。其实《清史稿》原文很清楚，即：方士衍于顺治二年九月，随父方国安进攻杭州，溃败，旋于余杭关头至小岭处，被清军副将王定国斩杀。

“辛者库，满语。汉译为金斗粮。辛：金斗，清朝粮谷的量器。者库：粮谷。清朝把犯罪的官僚、贵族、官商及亲属判罪送到内务府所属的辛者库做奴隶，食金斗粮。只给维持最低生活的钱粮。”（见第 850 页）没有解释清楚。何谓“送到内务府所属的辛者库做奴隶，食金斗粮”？既然辛者库为金斗粮，这岂不是“送到金斗粮，食金斗粮”？此言不及义者，乃缺乏必要之交代所致。应指出满语之原意是金斗粮，或称口粮，引申义则是“食金斗粮之奴隶”，或“食口粮之奴隶”，通常指内务府管领下食金斗粮之奴隶。

第 346 页“巴养元”条，称其是“清朝将领。康熙二十年降清，次年被斩”，既是清朝将领怎么还降清？令人莫明其妙。原来遗漏“随吴三桂叛乱”之交代。与此相同之谬误者还有：第 597 页“吕国宝，清朝将领。隶镶白旗汉军。崇德元年（1636）降清，授二等梅勒章京。”亦是清将降清，表述甚为怪异，原是遗漏“原明朝将领”字样所致。

缺少义项，不完整之谬。如“总兵”条（见第 2714 页）仅列两个义项：“①清入关前八旗世职；②军官名。清绿营兵之高级将领。”而军官名中实际遗漏清入关前之八旗官名。“巡抚”条（见第 699 页）遗漏清初曾设有操江巡抚，后撤；清末东三省建制，亦分别设立巡抚事。“西安”条，仅言“县名。在今吉林辽源。”（见第 567 页）而缺义项，漏陕西府名的西安。

轻下断言之谬。“普济玉林禅师语录，清释音讳编。未见。”（见第 2072 页）不当之甚。此书

现有康熙、同治刻本传世，另1990年台湾蓝吉富主编之《禅宗全书》亦收有此书，怎可谓“未见”？以己之未见，便断言否定其存在，不当也。又，此语录之编者“音纬”，书“音讳”错。

轻下断言不可，以模棱两可之模糊语言亦不可，而《辞典》中这类表达方式者甚多。诸如“张嘉颖，约康熙中任知府，修《楚雄府志》。”（见第1845页）“苏溪镇，镇名。当在湖南靳化境内。”（见第2777页）等等之表述皆不当。张嘉颖就是康熙时任云南楚雄府知府，五十五年领銜修《楚雄府志》；苏溪镇不是“当在”，而就在湖南新化境内。其“靳化”错，无此地名，乃“新化”之误笔。

缺乏对清朝史事的确切了解，不当存疑而存疑，自造混乱。“方犹，清朝官吏。顺治十四年科举考试时任主考官，坐纳贿弃市。《世祖本纪》作十五年事。”（见第324页）此撰稿者自惑于史事之疑。其实此案之过程本非常清楚：丁酉即顺治十四年南闈科场案，于当年十一月发生，考官方犹等被追究逮系。次年即十五年十一月，案结，方犹等被处斩。如此而已。

“黄朝宣，南明将领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明降将金砺征湖南，将其斩杀。另说，顺治四年（1647）长沙破，走衡州，为清将孔有德部杀。存异。”（见第1677页）此说错，亦不当存异。金砺征湖南于衡州杀黄朝宣是顺治四年，非二年。而“另说”中之所谓“孔有德部”，正是金砺。又，此刻金砺为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，是清军之重要将领，何可再提其二十多年前之往事（原明都司金砺于天命七年，即1622年于广宁投降后金），而称之为“明降将”？甚属不当。

（四）语词错误

作为辞书，语言使用尤应规范、审慎与考究，释义更应准确，《辞典》却相当随意，于是出现大量臆说、错解。

偏解、谬解。有些语词之解释，缺乏起码的语文文字素养甚至常识，或望文生义，以揣度释义；或文不对题，释此言彼；或以偏概全，不解释本义，只言引申义，或多义词只解一义，解释不当，等于未解；或不懂古文胡解乱解。

如“交涉”一词，解释为“项目名，此指交涉方面的开支。”（见第666页）偏解；“使臣，官名。奉命出使之大臣。”（见第1067页）错，非官名，乃泛指为奉命出使之臣，非止大臣；等等，均未解释出本义。有些虽解释了本义，却是错解。如“讦告，攻击告发他人的短处和私阴。讦告他人，按律处绞监候。又称讦诉。”（见第1559页）谬解。语词之释义及所举律例皆错。讦告乃揭发控告，或检举控告之义。且所谓“讦告他人，按律处绞监候”，哪朝哪代有此法律？实是臆说乱解。“综核名实”一词，解释为“综合考核品格声望与治国才干。”（见第2433页）“实”是实际，哪有“治国才干”之义？谬解。

不懂古文之错：“缪汧妻蔡，名蕙，字汧。”（见第2717页）错。《清史稿》（第46册14030页）原文“字汧”的“字”字，本是动词，乃许配、许嫁之意，即许嫁给缪汧之意，《辞典》却错误理解为“表字”，是蔡蕙之字，成了笑话。

硬拼立条与错解。所谓硬拼立条，即背离语言的规范，随意而为，将两三个语词硬捏在一起，成为一个不成词之词，实是短语，立为条目，加以串讲释义。如立“一日而偏”（见第1页）、“下无壅情”（见第69页）、“大删浮费”（见第93页）、“上尊谥庙号”（见第108页）、“初举日讲”（见第884页）、“迨秋”（见第1175页），等等，皆不当立为词条。其中，还有谬解，如立“刁衿挟制”为条目，解释为“抓住别人的衣领强使人服从。刁，抓住。衿，衣领。”（见第40页）谬解。其实刁衿乃是狡猾之绅士，即劣绅之义。如刁衿挟制这个短语算是一词的话，也只能理解成“劣绅加以要挟”之义。还有立“以谤为规”为条目，解释为“用指出过失之方式来规劝别人。《高宗本纪六》：‘尹壮图逞臆妄言，亦不妨以谤为规。’”（见第56页）又是错解。

此谤乃诽谤、诋毁之意。这四个字乃“将诽谤视同规谏”之意。等等。

错字的大量存在。还有对一些错字衍字的熟视无睹：如将丁魁楚字光山错作字老山（见第14页“丁魁楚”条）、萧伯芝错作尚伯芝（见第16页“七大恨”条）、将休致错作休政（见第245页“于振”条）、将方俊错作方浚（见第323页“方浚”条）、将范文程错作范文成，将汤斌错作汤文武（见第337页“尹嘉铨”条）、将《杲堂文钞》错作《果室文钞》（见第762页“李邺嗣”条）、将谢三宾错作谢三宝（见第2772页“苏壮”条），等等。

释文中的难以理解之词——“清季”。尤为怪异的是在一些释文中，特别在有关地名的释文中，出现了至少不下900处令人难得其解的“清季”一词，诸如：“七盘岭，山名。位于今四川广元北境。清季为广元县境名山之一。”（见第18页）“东江，河名。位于今上海松江东境。清季为华亭县所辖。”（见第955页）其中“清季”何义？殊不可解。按字面理解，“季”字有末尾之意，“清季”当是“清末”之意。然而令人难以解释的却是，何以清末才是名山、才确定归属？而其他时间段，如清前期、清中叶又为何不是？清前期、清中叶情况又如何？这更令人糊涂。而《辞典》词条释文中不乏“清末”一词，然而这种“清季”、“清末”之使用，令人愈发糊涂。也许“清季”应该是“清代”之意。然而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，“清季”一词，散布全书，其间夹杂一些“清末”，而每个词在不同的具体语言环境中，含义又各有不同，对错参半。如第2820页“醴泉”条中有两个义项，其一曰：“县名，治所在今内蒙古突泉。清季弛禁召垦，移民日增。”其二曰：“山名，位于今四川眉山西境。清末为眉州直隶州辖之。”显见，其二的“清末”，仍不可解，可以视同为“清代”，而其一“清季”实乃“清末”之意，改为“清代”则谬。而“国朝松陵诗征，书名，收清季松陵（今江苏）人之诗而成集。乾隆三十二年爱吟斋精刊本。”（见第1731页）此“清季”则是“清初”之意了。然而“清季”本身并不含有清初之义项，用此则无疑为谬。那么，此处“清季”该是何义？令人费解。

综上述诸多问题诸多谬误的汇集，构成了《辞典》严重的致命伤。尽管有众多撰稿人的辛勤劳动，使《辞典》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但与它同时存在的诸多谬误相较，已不成比例。本应释疑解惑，到头来，不仅疑惑未解，反而谬误重重，散布了诸多常识性的错误。在这部收词6万余条的辞书中，有谬误者不下3000条，就是说它至少有5%的错误。即使按对正常出版物的要求来说，也已不合格。

四、结 语

《辞典》编纂失败，发人深省，让人们不能不探求其失败的原因。

首先，总纂统编者清史基本功不足。编纂辞典本是极为严肃而艰巨的重任，非知识广博学识深厚并严谨敬业的专家里手所能承担，而编纂《清史稿》的辞典，除应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外，更需具备的是对清史的熟悉、对《清史稿》有全局把握和深入系统的研究。而《辞典》将那么多的清史知识弄混弄错，甚至常识性的东西茫然不清，足见总纂统编者缺乏对清史的研究。编清史辞典竟然不洞悉清史，这是致命的根源。

其次，体例不明。编纂好一部书，首先必须有明确的体例，以严格规范参与者，包括统编者与撰稿人，明确责任之所在。从全书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看，留给人们的印象是，统编者心中无数，以致编辑混乱，毫无章法，而相当多的撰稿者似乎在随意而为。释文中所以夹杂那么多无关清史的赘文，究其原因在于全书没有严格统一的行文体例、规范要求，这就使参与编纂者无所约束，导致了全书混乱的基础。

第三，统编中的责任缺失。人们看到，《辞典》的释文既有用力甚勤，也有言不及义者，因为相当部分的撰稿者并非专攻清史，不免说错话、外行话。初稿存在这种参差不齐的现象实属正常，但这些问题应在统编时，由统编者加以解决。然而《辞典》的总纂统编并未负起责任，或是力不胜任，应付了事，竟致混乱不堪。

第四，审稿不合格。审稿本应是把住质量关，提高被审著作质量之保证，因为它能发现与纠正谬误，并删除杂芜，画龙点睛。然而，《辞典》虽然名义上请专家多次审稿（其《前言》所谓“清样九易”），结果那么多的问题竟审查不出来，一律放过。

《辞典》编纂失败，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。

它告诉人们，主编、总纂关系一部书的成败。有什么样的主编、总纂，便会编纂出什么样的著作来。所以选得其人，其书之成功便有保证，否则便是自寻苦恼。《辞典》的失败恰恰出在主编问题上。应该指出的是，虽然该《辞典》标明著名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为第一主编，其实，孙教授是被借用了名义。当年孙教授以其精湛的清史功底和在学术界的崇高声望，被聘为唯一主编。他有一整套编好该《辞典》的学术设计与人事安排，曾一再强调《辞典》一定要编出特色来，要纠正《清史稿》的谬误，弥补其缺漏。然而工作刚一启动，便突染重病，溘然长逝。之后，其部署便全被改变，出来一位并列主编。所以《辞典》出现的谬误与孙教授无干。从前面的剖析中，已见《辞典》出现诸多谬误，不仅充分暴露了《辞典》的实际主持人学问根底匮乏，亦充分暴露其敷衍塞责的工作态度。正是由于这些严重问题，导致《辞典》的失败。这一惨痛教训已清楚告诉人们，必须重视学术，慎选主编，选择竭诚敬业的专家的极端重要性。

它警示人们，应多一些审慎，少一些急功近利。不论出版单位抑或学者个人，绝不可利令智昏。应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，审慎精勤治学，把认真求实放在首位，不为金钱名利所诱，善于自持。应有自知之明，没有坚实的学识根基，特别是非所专攻，不可染指力所不及之事。

它提示人们，审稿应有责任制。为确保审稿质量，不妨将历次审稿者之名单列出印在书籍上，以明示责任。审稿不仅有名有利，更有责任与风险。出版之著作如有疏失，不妨逐一溯查，以此使无力审稿者望而却步，敢于承担审稿者亦尽职尽责，庶可免蹈《辞典》经多次审稿竟成废书之覆辙。

它更提示人们，当前迫切需要对辞书的评论并使辞书热降温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辞书业呈现繁荣景象，但所出辞书不少，评论之作却寥寥无几。造成精品无人识，而劣作竟招摇过市，贻害社会。为杜绝此事之发生，应加大评论力度，积极鼓励撰写真正的书评，肯定优秀，揭穿伪劣，让真善美发扬光大，令制造伪劣者无所遁形，以警示学术界，净化文化园地，净化文化出版事业。

〔作者张玉兴，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沈阳 110031〕

（责任编辑：路育松 责任编辑：李红岩）